

本期专题·改革开放40周年

- 02 五个关键词读懂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觉醒
- 04 40年后,改革开放再出发
- 06 40个“第一”回顾改革开放这40年
- 14 改革开放40年成就的经济学解释

全球大观

- 15 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深层原因

经济纵横

- 17 除了5000起征点,个税改革还有三大难题

悦读时光

- 封三 世界难民日:愿世界无难民

编者按:2018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40年砥砺前行,40年沧桑巨变,40年时间不仅全面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是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

1978年,我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当时我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当时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人均GDP平均数是490美元,我们连它的三分之一都没达到。就是在这么低的起点上,1978年至2017年的39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5%,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34倍。2017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9480美元,上升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距离高收入国家人均GDP12700美元的标准已相当接近。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当然不仅仅是餐桌上的变化,不仅仅是温饱,也不仅仅是经济体量的剧增以及随之而来的跨入中等收入门槛。实际上,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最根本、最具决定意义的变化,就是人的自由度的增大。正是有了自由以及不断跟进的制度化认可,人们才有可能释放出创造潜力,在经济领域实现了飞跃式发展。改革开放已不仅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同时也已成为人们的精神力量和社会责任。以往40年的历史提示人们,只有在改革开放的路上前行,中国才会如以往那样遇到各种发展之机,从而抓住这些机遇,顺应时势,进而促成和成就历史之变。

改革开放的道路远没有结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这样历史方位中的发展中国家,从现代化进程的视角看,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压力,就是如何完成社会的综合性转型,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单一的经济或收入问题,而是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安全、生态等诸多因素在内的综合性转型难题。历史方位变化对改革开放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在新时代我们必须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创新,新一代人,改革开放的任务艰巨,任重道远。

本期推出“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回顾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梳理这40年时间里,标志着改革印记的重大历史事件。从历史、国情、经济、社会等角度分析我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以及中国当前处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我们如何与时俱进地进行新一轮改革开放。希望为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其他栏目的文章也期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主 办: 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 臧 科
主 编: 戈建虎
副 主 编: 张安红
责 编: 王智芹

地 址: 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 224005
电 话: 0515-69971581 18751431986
邮 箱: 417967615@qq.com
网 址: www.yctsg.cn

设计制作: 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五个关键词读懂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觉醒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一个重要坐标和时间节点。五个关键词,带你读懂改革开放为什么是“伟大觉醒”。



关键词一:深刻反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与伟大觉醒相伴相随,有了伟大觉醒才有了改革开放。那么,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伟大觉醒?

1. 对过去历史的深刻反思。上世纪50年代末,我们党开始犯“左”的错误,“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在党中央占主导地位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这个时期经济濒于崩溃边缘,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和带来的后果,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2. 对现实国情的深刻反思。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十年内乱后的中国,经济濒于崩溃,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当我们打开国门,看到与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是周边国家和地区存在的巨大发展差距时,给我们带来的是惊诧和震动。1978年10月,邓小平同志应邀访问日本。访问期间他参观了日本的

钢铁、汽车和电器工厂。他在考察日产汽车公司时感慨地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改革开放就这样在全党全社会逐渐形成共识,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3. 思想认识上的反思觉醒。我们党带领人民获得的伟大觉醒,正是从40年前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思想理论大讨论,是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声。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伟大觉醒呼之欲出,实行改革迫在眉睫,改革开放的思想在全党形成共识。

关键词二:关键一招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

1. 发生在关键时间节点。文革后期,中国经济濒临崩溃,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发生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彻底把中国从不改革就要爆发危机的危险推向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使得国内国外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2. 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是党的领导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我们党可以无私无畏,勇于做、能够做其他政治力量不能做、不想做的事。这也是我们党在遭遇挫折时,可以迅速纠错,扭转时局,化险为夷,开创新局面的原因。二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人民群众始终是

改革开放的实践者、推动者、参与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突破新事物新成就,都凝结着人民群众智慧和汗水。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我们党的命脉。三是决定了命运。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没有今天哪有明天。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改革开放让饱受饥饿的人民得到了温饱,让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关键词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 形成了伟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并不断发展的。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开辟到拓展、完善、巩固的40年。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繁荣发展。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但是,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要有效、有用,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时期的生动实践,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党通过理论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有效有用的。

2. 开辟了一条人间正道。人间正道是沧桑。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代中国的人间正道,就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改革开放是中国道路的鲜明特征和强劲动力。

关键词四:新的伟大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为

什么说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

1. 新的。改革开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新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主义没有给出方向,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实践过。它是党带领人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次全新实践。

2. 伟大。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的伟大抉择,是促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新探索。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可能有”。将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不改革,制度就会僵化,就会束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就没有生机活力,就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3. 革命。我们党认为,改革开放它不是体制的枝节修补,不是改良,而是一定意义上的一场“革命”。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场社会革命引起了我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等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关键词五:将改革进行到底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国过去40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要做到:

1.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时代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成果靠的是人民群众的大胆探索、勇敢实践,人民群众是改革开

40年后，改革开放再出发

这一波改革开放，整整40年了。一代青年成白头，复又一代新青年。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对更好生活的追求，真可谓不休不止。这也不奇怪，哪个国家不是如此？这是基本的人性，是普遍的天理。只不过，具体应该怎么做，有的还在深渊中摸索，有的历经艰难险阻，终于踩准踩实了几块可堪继续过



河的主体。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党始终不忘的初心和奋斗目标。

3. 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但没有办成的大事，新时代推动改革开放，就要继续推进“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布局。

4.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面临了新的挑战和问题，面临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形势总结出的深刻经验，起着指挥棒的作用。历史经验表明，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科学发展，就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到发展的全过程当中。

5. 坚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对外开放的政策中，我国始终秉承着“中

河的大石头。

中国做对了什么？现在在哪里？要向哪里去？

40年来，中国农民屡挫屡奋，摸索出“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得到中央认可和推广，几年风行全国，一举克服了“吃饭”老大难；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恢复因“文革”中断多年的高考，逐步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认知转换与各行各业人才的基本供给；重开商品经济，鼓励私营企业，国企抓大放小，闯关价格机制，摆脱姓资姓社的争议，努力让市场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激发了创业激情；引进外资，建立经济特区，加入WTO，到如今的大湾区与“一带一路”，坚持着向世界开放的大方向；从八二宪法到私产入宪，人权入宪，从1989

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原则，提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6.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良好的开端和效果，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党要紧跟时代前进步伐，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解决党内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党带领着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变革！过去40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还是要依靠改革开放。

(2018-5-20 求是网)

年行政诉讼法落地,到2017年首提“合宪性审查”,法治国家的大方向没有动摇。

这40年,是一个国家功能逐渐调整的过程。告别无所不包的计划思维,将一些具体决策权力下放到省市与区县,分散到企业与村组,归还给家庭和个人,让市场机制协调个别决策,让基层自治取代“一管到底”,让人心的常情常理取代各种各样的内斗内耗,极高的制度费用,得以大幅降低。

这40年,也是一个人民逐渐“出场”的过程。老百姓在用深藏于身心的“人力资本”一点点争取财产权利的同时,不断扩展着自生自发的秩序。从乡镇企业到进城务工置业定居,从社会互助到主动参与公共治理,个人的权利意识与自主性,得以大大提高。

这40年来,国家为人民的自由发展让出空间,人民的能动性成就着国家的富强与文明。国家的功能调整与人民的逐渐出场,恰如互济互生的阴阳两极。两者都在各自的分寸上运行,构成一幅充满活力生生不息的太极图。

这两者关系的初步理顺,为中国40年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这个过程还在继续,不论社会舆论,还是国家治理者,都有一个极其清晰的共识:改革开放远没有完成。如习近平所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些难啃的骨头,就是将来三四十年来要完成的临门一脚,甚至几脚。

在过去40年经验基础上的继续改革,譬如农村土地与集体资产的改革,公益社会组织的发展,国企股权向社保基金的划拨,行政审批继续简政放权,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肯等等,都行走在正确的路上。这些改革很重要,但还不算最难啃的骨头。

最难啃的骨头是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个现代化之所以极其根本,是因为它要解决国家持续稳定的问题,要解决保持国家统一与激发地方活力兼得的问题,要平等而充分地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各项权利,要将各级权力的产生与运转纳入现代程序正义,要解决从根子上防止权力腐败的问题,要让司法裁决机制成为不断生成正义的定海神针等等。在根本上,这还是一个各种利益主体共赢的过程,可长可久,对谁都有好处。但过程肯定包含着阵痛,一些既得利益,要知所进退,有所取舍。在各种利益诉求与不同的思想认识之间,如何尽量弥合分歧,达成一致,团结一致向前走?

想想40年前的改革肇端,如此巨大的分歧和困难,不也迅速顺应民心打开了局面?想想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国这艘巨轮是怎么重新启动的?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点,前瞻,后顾,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理应都更成熟了。人民要更清晰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新一代的改革者们,得不断回应民众的正当诉求,以百姓心为心,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往无前地走下去。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现代转型,其实已经170多年。中国要完成的,是向现代国家的凤凰涅槃。在这场连绵起伏的接力转型中,我们要建立强大的国家主权,要有尊重良宪良制的现代国家治理,要温故知新地发展出蔚然流行的文教体系,要挺立起自由自立的个人与温暖而有力的社会。未来三四十年,这几个维度,一旦全部得到妥善的解决,每一个不自暴自弃的现代中国人,就能获得最好的自我实现的环境。

行百里者半九十,改革开放这临门一脚,任务艰巨,新一代人,任重道远。

(2018-6-21 南方周末)

40个“第一” 回顾改革开放这40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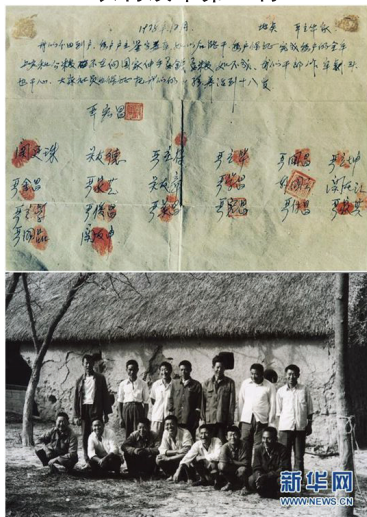
▲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会议公报

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一路向前,既改变了中国,也改写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40年40个“第一”,这些印记,哪些让你终生难忘?

破冰前行

中国改革从农村起步,向城市延伸。农民工进城、个体户、企业承包经营等新事物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对外开放、特区设立等重大举措不断推出……改革开放凝聚起最广大的共识,激发出亿万人的活力,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勃。40年前,发端于小岗村的“大包干”成为改革开放一声春雷,冲破思想桎梏,唤醒沉睡的大地……

农村改革第一村



▲ 拼版照片:上图为1978年冬,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契约(资料照片);下图为1981年,部分“大包干”带头人在茅草屋农舍前合影(资料照片)。

第一家合资企业



▲ 1980年4月10日,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被批准成立。北京航空食品公司厨师长、法国人孟培沙(左二)和助理厨师长、香港同胞邓耀全(右二)等在一起研究航空菜肴的配制(1986年5月摄)。

第一个经济特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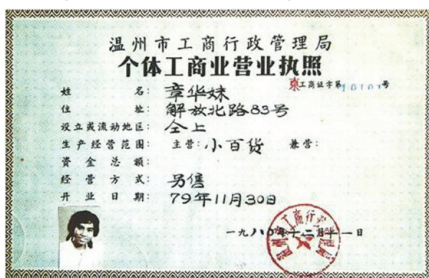
▲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40年来,深圳从边陲渔村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的金融科技创新之城。上图为建设中的深圳经济特区。(新华社记者潘家珉摄)

第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



▲ 我国第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1980年在国营天津无线电厂建成并投入试生产。这是试生产装配的彩色电视机在通过老化检验。(新华社记者李昌元摄)

第一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1980年12月11日,卖纽扣的19岁温州姑娘章华妹,如愿以偿地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了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工商证字第10101号。

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



▲ 收藏爱好者收藏的春晚磁带。

1983年的除夕,当人们围坐在一起享受团圆,等待新年来临之时,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正式开始。

第一只股票



▲ 1988年春节前夕,上海真空电子、飞乐音响、爱使电子股份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部向全市3万多股东发放1987年的股息红利。(新华社记者张明摄)

1984年11月18日,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发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1万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公开向社会发行的股票。

第一个专利申请号



▲ 198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开始实施。当天上午8时,在北京的中国专利局受理处门前,已有数百人等候申请专利。新华社记者巫加都摄

原航空航天工业部207所工程师胡国华拿到中国第一个专利申请号,成为中国专利申请“第一人”。

新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



▲ 1987年12月1日下午,深圳市政府举行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活动,敲下新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深圳房地产公司经理骆锦星(举11号牌者)以525万元的价格,获得市政府拍卖的一块住宅用地的使用权。新华社记者程至善摄(传真照片)

第一家肯德基餐厅



▲ 1987年10月10日,肯德基餐厅正在试营业。1987年11月12日,美国快餐公司肯德基在中国的第一家餐厅在北京前门繁华地带正式开业。

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1988年5月10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

第一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 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新华社记者 张刘仁 摄
1988年10月31日,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全线通车。截至2017年底,13.6万公里,位列世界第一。

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大会会场。
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1月26日宣告成立并于12月中旬正式开业。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正式挂牌营业。

第一家互联网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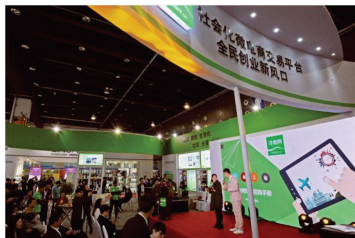


这块广告牌所指的地方,正是中国第一家互联网接入服务商“瀛海威”。沉舟侧畔千帆过,在它身后涌现的一代代互联网企业真实地改变了中国。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民模已达7.7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占比97.5%。2017年,中国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7小时。

大国崛起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稳定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蓬勃生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第一笔电子商务



▲ 2017年4月11日至13日,以“共享经济,连接未来”为主题的2017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在浙江省义乌市举行。新华社记者 谭进 摄

1998年4月7日,中国电子商务第一单不期而至:北京海星凯卓计算机公司和陕西华星进出口公司利用中国商品交易中心电子商务系统进行了首单电子交易。如今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17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29.16万亿元,同比增长11.7%。

第一颗导航定位卫星



▲ 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导航定位卫星。新华社记者 查春明 摄

2000年10月31日凌晨,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导航定位卫星——“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2001年11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签字仪式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 摄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于当年12月11日生效。

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



▲ 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内蒙古主着陆场成功着陆,返回舱完好无损。(新华社记者 张领 摄)2003年10月15日9时,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成为浩瀚太空的第一位中国访客。

第一列动车组列车



▲ 2018年2月1日凌晨,动车组停靠在武汉动车段的存车线上,准备进行检修和保温作业。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2007年12月22日,中国首列国产化时速300公里“和谐号”动车组列车竣工下线。2017年6月26日,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在京沪高铁两端的北京南站和上海虹桥站双向首发。到2017年底,中国铁路里程达到12.7万公里,高铁里程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的66.3%。

第一次举办奥运会



▲ 2008年8月8日晚,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举行。这是北京奥运会主火炬塔点燃后,焰火在国家体育场上空形成五环图案。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2008年8月,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行。2018年2月25日,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随着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北京正式接过奥运会会旗,冬奥会正式进入“北京周期”。

第一次举办世博会



▲ 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5月1日至10月31日举行。2010年4月30日晚,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式大型灯光喷泉焰火表演在上海举行。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第一艘航空母舰



▲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2012年9月25日上午10时许于辽宁大连正式交接入列。图为“辽宁舰”出海进行科研试验和海上训练(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 查春明 摄

首次深潜超过7000米



▲ 这是2012年6月1日拍摄的准备入水的“蛟龙号”载人深潜器。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摄

2012年6月24日,中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西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试验海区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最新记录,首次突破7000米,最大下潜深度达7020米。

伟大复兴

时序更替,梦想前行。随着改革的深化,一些难度很大而又不能绕开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正如登顶前可能遭遇陡坡,离目标越近越要攻坚克难。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各领域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拔地而起,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会停息!

第一个自贸区



▲ 上海自贸区的航拍照片(2017年3月9日摄)。新华社记者丁汀 摄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建立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 2018年4月30日,游客在广西龙胜龙脊古壮寨观赏梯田美景。2018年“五一”假日,国内旅游收入871.6亿元,同比增长10.2%。新华社发(王滋创摄)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0.5%,首次突破50%。

第一笔沪港通交易



▲ 这是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一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内的沪港通宣传海报(2014年11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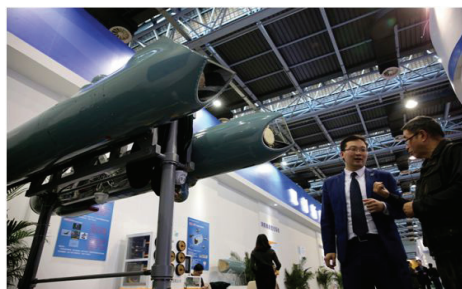
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开通仪式在上海和香港交易所同时举行。伴随两个市场同时鸣锣开市,沪股通和港股通首单交易“花落”伊利股份和长江实业。

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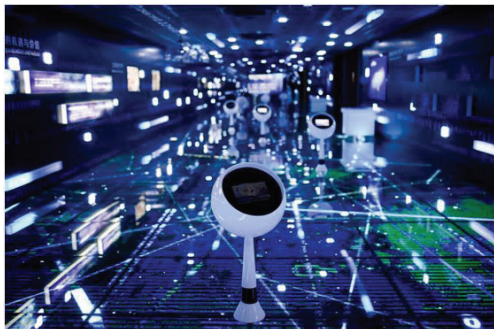
▲ 2014年11月21日,为期3天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落下帷幕。图为与会嘉宾参加闭幕式。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首个全国“双创周”



▲ 2015年10月19日至23日,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在全国举行,主会场设置在北京中关村。2015年10月23日,观众在了解一款机载光电探测制导设备。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 这是2017年5月25日拍摄的贵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内的“时光隧道”。新华社记者 刘续摄

2016年3月2日,“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正式揭牌,这是我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首台全部使用国产处理器构建的超级计算机



▲ 这是安装在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2016年6月20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响摄

2016年6月20日,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全部采用国产处理器构建的“神威太湖之光”夺得世界超算冠军,成为全球运行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 2017年6月15日,在乌鲁木齐南山观测站,“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过境,科研人员在做实验(合成照片)。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2016年8月16日,我国成功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

首次在中国举办G20峰会



▲ 2016年8月25日,园艺工人在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街头维护G20主题花坛。新华社记者 尹栋逊摄

2016年9月4日到5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这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催生的G20领导人峰会首次来到中国。

人民币第一次成为“储备货币”



▲ 2016年9月30日,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部,IMF 总裁拉加德就人民币纳入SDR 发表讲话。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 特别提款权,这意味着人民币第一次成为“储备货币”。

第一架国产大型客机



▲ 2017年5月5日,中国首款国际主流水准的干线客机C919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首飞。新华社记者丁汀 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 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新华社记者张铎 摄

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



▲ 2017年8月18日,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成立。这是刚挂牌的杭州互联网法院(2017年8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翁忻昉 摄

第一批入驻雄安新区的企业



▲ 2018年3月29日无人机拍摄的雄安市民服务中心。新华社记者牟宇 摄

2017年9月28日,河北雄安新区管委会称,已有48家企业首批获批入驻河北雄安新区。首批获批落户的48家企业全部为高端、高新企业。随着《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正式公布,一个高质量发展的全国城市样板蓝图跃然呈现,一个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即将启动。

首只体细胞克隆猴



▲ 克隆猴“中中”和“华华”在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非人灵长类平台育婴室的恒温箱里得到精心照料(2018年1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金立旺 摄

用一把毫毛，变出千百个一模一样的猴子——《西游记》里的神话正在成为现实。世界上首只体细胞克隆猴“中中”于2017年11月27日诞生。

首部无人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管理法规



▲ 2017年9月10日，在无锡举行的2017世界物联网博览会上，参观者在体验无人驾驶汽车。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2017年12月19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颁布了国内首部无人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的管理法规，率先填补了这方面的立法“空白”。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 拼版照片：在三亚市鹿回头景区鸟瞰三亚市景今昔对比（上图为1991年2月新华社记者姜恩宇摄，下图为2018年4月4日新华社记者郭程摄）。2018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并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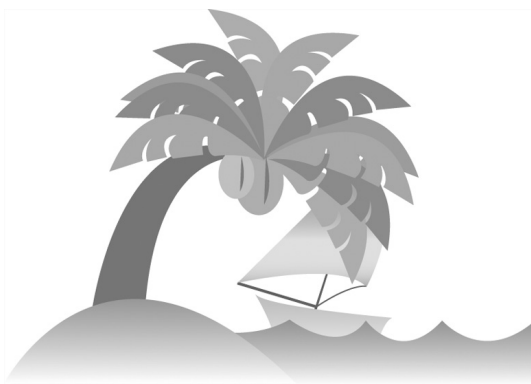
经过长期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不懈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党的十九大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部署。今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领域将更广、举措将更多、力度将更大。穿越革命和建设的洪流，激荡改革与开放的风云，按照“两个阶段”“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中国这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如今正朝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进。

（2018-5-23 光明网）



改革开放40年成就的经济学解释

2018年6月23日,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和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2018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年会“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回溯与新时代展望”在合肥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特别邀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dward Prescott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等30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合肥工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梁樑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梁樑代表学校对与会嘉宾表示了诚挚的欢迎,他介绍了合肥工业大学近年来的发展情况,祝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我校成功召开。合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罗云峰对大会的召开表示了祝贺,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合肥市的发展现状,对合肥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并预祝本次年会圆满成功。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1978年,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负笈海外,背负着无数中国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期许。刘鹤、周小川、易纲、林毅夫、田国强钱颖一、周其仁等一批杰出的留美经济学人积极参与国家的各项事业,在不同领域推动了国家的发展。

对于中国为何能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经济学界有许多解释。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的成长是中国30多年经济成功的决定性力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离不开企业家的才能。但“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转型国家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经济现象,强调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发展符合比较优势。在论坛上,姚洋教授综合了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范围,中国目前处于高储蓄高投资阶段。中国发展的成功需要彻底的工业化,并且在出口制造业方面需要更高的机械化制造。

但是,为什么众多同样采取了新古典经济学政策主张的国家却没有取得同样瞩目的成就呢?60年代兴起的新马克思经济学流派则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原因归咎于发达国家的掠夺。最具代表性

的依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核心国家)凭借自身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通过压低发展中国家(边缘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和抬高本国工业品价格使经济剩余由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转移,导致边缘国家在这种依附状态无法实现经济发展。虽然“主流”经济学派一度对依附理论嗤之以鼻,但不可否认不少“主流”经济学家开始重视研究不平等的国际结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的影响。“北京共识”就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掠夺性。因此,“北京共识”的提出者乔舒亚·库珀建议,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相应的政策而不是盲从西方的理论,这样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有效发展道路。

对于中国经济成就背后的原因,姚洋提出了自己的解释版本。他认为关键在于中国人很务实、中国政府是中立的、中国官僚体制任人唯贤。就务实主义而言,他认为,如果中国没有务实主义,很难取得如此成就。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行动。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的重要特征就是结果导向。例如邓小平著名的“白猫黑猫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他借鉴了文化视角进一步解读中国文化中的务实特点。

在理论层面,他认为“三个代表”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求真务实的典范,使得中国共产党去政治化,进而能够吸纳社会各阶层、各行业人士。在实践层面,适时推出乡镇企业、价格双轨制和财政分权等制度也表现出中国政府的务实作风。

他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从本质上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也就不被任何利益集团左右。在其它国家,政党往往是代表一部分群体的利益。所以他建议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不能从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概念去套。他举了个例子。为什么60年代菲律宾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5倍,而现在反过来中国是菲律宾的3倍?那是因为菲律宾的政治很糟糕。他们的党员

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深层原因

6月19日,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莉在美国国务院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向全世界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意味着美国提前结束原本2019年到期的任期。

美国此次匆忙辞职,理由大概有四点。

一是表明对盟国以色列的坚定支持。黑莉在新闻发布会上对美国退群理由进行阐释时明确指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存在偏见”。实际上早在2017年,美国方面就表示,如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解除“对以色列的不公正待遇”,华盛顿方面就将退出该组织。2018年年初以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通过5个反以色列决议,这显然激怒了美国。出于对盟国以色列的支持,美国要以这个极端的方式表明态度以示抗议。美国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的多番指责是“不合比例的关注”与“毫无休止的敌对态度”。

二是美国认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效用有限。美国认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不能有效保护人权,比如对在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发生“大规模侵犯人权”问题时

未能及时作出应对。在美国看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不能服务于美国的人权外交需求,相反,有时还成为美国人权事业的牵制。鉴于人权理事会的广泛代表性,且发展中国家较多,这使得美国在该机构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比较有限,美国并不能在该机构中发挥领导力,这让美国很是不爽。

三是美国多次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改革计划落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指责该机构存在不合理的地方,甚至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为“藏污纳垢之地”,指责一些国家阻挠美国对该机构的改革。美国不仅未能推动该机构改革,还成为该机构的批评对象。比如前不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批评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指责美国政府虐待儿童。2018年以来,美墨边境1995名移民儿童被强行从父母身边带走,骨肉分离的悲剧引发舆论强烈反弹。这些显然使得美国很不高兴。

四是美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下降。纵观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退出的重要国际组织,撕毁的重要国际

对自己的党没有忠诚可言,总统从哪个党产生,60%的党员就跳过去。中国共产党却能凝聚一批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工作的人。

毫无疑问,良好的选拔制度使得一大批优秀的地方官员脱颖而出,使得他们能较好地实施改革和执行各项政策促进经济的发展。中国有悠久的精英选拔制度,例如西汉建立的“荐举制度”、隋唐建立的“科举制度”。而当今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根据姚洋教授的研究,基本上能够成功地挑选出教育水平良好,政绩突出的官员。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重庆大学教授姚树洁在论坛上表示同意姚洋的观点。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中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和政治生态特点。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总是试图将自身工业化历程抽象出一般化理论,强加于发展中国家。正如60年代拉美经济学家所批判,这些发展经济学理论无视发展中国家拥有迥异于西方的历史变迁、文化习惯和社会背景等,也不加以审视西方“殖民历史”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伤害以及国际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正。“现代化理论”对拉美以及“休克疗法”对俄罗斯的灾难性破坏使得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反思自身的发展道路选择。而中国正是选择了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取得了瞩目的经济成就。姚洋教授在演讲结束时展望:“中国经济增长中政治经济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为广大学者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实验研究领域。这给了我们机会可以通过研究中国形成伟大的理论。”

(2018-6-25 凤凰国际智库)

协议已经比比皆是，一连串的退群毁约举措让世界已经见怪不怪。缘何会出现如此情况，这与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的政策导向不无关系。美国优先实际上也是美国国内优先，特朗普政府专注国内经济振兴，对国际领导、国际规则不太感兴趣，反倒是卸责现象明显，因而退群毁约也就在情理之中。

整体而言，美国退群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影响不大。不过美国开了个不好的头，严重地削弱了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的权威性，这对于全球治理而言并非好事。“美国优先”的外交导向使得美国越来越是只要里子而不要面子，这毫无疑问会削弱美国的国际信誉，使得美国的国际动员能力受到冲击，从长期来看，对于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将造成负面影响。（凌胜利 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副教授）

自特朗普 2017 年初上台伊始，美国政府反复威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称如不改革美将退出。既往一年多，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莉本人多次斥责，“人权理事会通过针对以色列的 70 多项协议，针对伊朗的仅 7 项，这两国人权记录天差地别。”19 日的正式退出是对此前威胁的兑现。这一“退出”动作本身并不令人意外。自特朗普 2017 年初上台伊始，美国政府反复威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称如不改革美将退出。既往一年多，黑莉本人多次斥责，“人权理事会通过针对以色列的 70 多项协议，针对伊朗的仅 7 项，这两国人权记录天差地别。”19 日的正式退出是对此前威胁的兑现。

美国“价值观外交”边缘化

这一动作背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思路，以及这一思路折射的美国处境令人深思。在退出人权理事会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斥其“无法有效保护人权”、持有政治偏见、且相关成员国人权状况堪忧，当然仅是表象。深层次原因在于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的执政思路突出特征之一即是所谓“价值观外交”边缘化。

2017 年 5 月 3 日，特朗普上台后的首任国务卿蒂勒森对美国国务院全体工作人员发表讲话时就已明确表达将价值观外交边缘化、注重实利的务实主义信条。他说：“尽管自由、人权、尊严这些根本价值观引导美国外交政策，但这些只是我们的价值观，不是我们的政

策。价值观不变，但政策会变，政策需要因地制宜。”由此可见，所谓人权问题从一开始就被踢出特朗普政府外交考量的优先项。

特朗普政府的执政思路与前任相比是颠覆性的。回顾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历史，自 2006 年成立伊始，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就拒绝加入。奥巴马上台后姿态反转，美国成为理事会成员国之一。如今特朗普政府主动退出，与小布什时期对理事会的不满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根本区别在于，特朗普时期的外交政策思路发生了重大转折。

以美国主义取代全球主义

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宣布退出，又在退出时留下余地：“如若理事会启动改革，美国或可考虑返回理事会。”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对于“价值观外交”毫无兴致，他们要摒弃的是国际体系规则本身，要以实力取代规则，以美国主义取代全球主义。这是真正的、彻底的不按常理出牌。特朗普政府想要的是最大限度地抛弃美国所谓“责任与义务”，该忽略的忽略，该分摊的分摊，降低成本，单刀直入，捞取美国利益，增加美国实力。

除了在与人权理事会的冲突上，“用绝对的利益取代规则，用绝对的美优先取代全球考量”这一思维在亚洲、欧洲以及全球治理的多个领域一脉相承。在亚洲，特朗普政府强调与亚太盟友的防务分摊，强调将多个议题打包谈判。在欧洲抛出北约“过时论”，要求欧盟承担更多防务支出，宣告“搭便车”的时代已经结束，保护与被保护都只是一场交易。而在区域与全球治理领域，接连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协议，以及退出在巴以问题上同样与特朗普政府尖锐对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面对冷战结束以来的权力转移，曾经陷入单极世界狂喜之中的帝国如今进退维谷，战略扩张已然难以为继，而退回孤立主义亦不可能。美国需要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却希望盟友仍然对其百分百俯首忠诚；他需要美国的实力优势，但不愿承担成本。而在这一切背后，美国需要首先想清楚的是如何克服美国可信用透支本身带来的关卡和矛盾。（陈晨晨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宏观研究部副主任）

（2018-6-20 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

除了 5000 起征点,个税改革还有三大难题

按最新进展修改,拟将个税起征点由 3500 元提高至 5000 元/月(6 万元/年);拟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 4 项劳动型所得纳入综合征税范围;并首次增设专项扣除,将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自 1995 年中国提出建立覆盖全部个人收入的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时隔 24 年,终于在今年迎来一次重要调整。这标志着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征收方式正式迈进。

根据《草案》规定,扩大 3%、10%、20% 三档低税率的级距,3% 税率的级距扩大一倍,现行税率为 10% 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 3%;扩大 10% 税率的级距,现行税率为 20% 的所得,以及现行税率为 25% 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 10%;现行税率为 25% 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 20%;相应缩小 25% 税率的级距,30%、35%、45% 这三档较高税率的级距保持不变。

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主管合伙人王冬生表示,此次个税修法与以往相比,是本质的进步,在提高费用扣除标准(俗称的“起征点”)的同时,向综合征收迈出了实实在在的一步。在王冬生看来,此前中国的个税制度一直实行覆盖全部个人收入的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而此前多次修法,始终围绕在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并没有改分类征收的模式。尽管这次个税修订只是对部分所得的综合征收,但为以后走向完全综合征收的模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未来,个税改革的重要方向是由分类征收走向综合征收,个人综合征收走向家庭综合征收的模式。

5000 元的争辩

中国曾经历了数次个人所得税扣除额的修改,直到 2018 年,个人所得税才迈入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此前的历次个人所得税的修改主要是提升扣除额度,2005 年,中国将工薪所得税扣除额从 800 元提高至 1600 元;2007 年将扣除额从 1600 元提

高到 2000 元;2011 年个人所得税扣除额将从现 2000 元提高到 3500 元。直到 2018 年 6 月 19 日,拟将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 5000 元/月(6 万元/年)。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认为,扣除额无论是 3500 元还是 5000 元,首要考虑的是纳税人的必要生存成本,这就是怎么测定的问题,测定成本要优先照顾人们的吃住穿、教育、医疗等必要成本。

王冬生认为,5000 元的扣除标准是高还是低,在判定之前,需要对扣除问题进行定性分析。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再分析扣除高低的问题。计算工资薪金时,扣除一部分,超出扣除标准的部分,才作为所得征税。为什么扣除?扣除在本质上是生计扣除,必须扣除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支出,如果不能充分扣除,就不能满足需要。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月租金为 2000 元左右,每天吃饭、交通等费用至少 100 元,一个月至少 3000 元,所以 5000 元是不高的。再考虑到,扣除这 5000 元的前提,是把劳务所得等综合收入加入其中,5000 元就更不高了,甚至可能是降低了,因为劳务所得以前至少扣除 800 元。

2016 年两会,时任财政部部长的楼继伟曾表示,简单提高个税起征点是不公平的,一个人的工资 5000 元可以把日子过得很不错,但考虑到养育孩子、赡养老人等就显得非常拮据了,所以统一减除标准本身是不公平的,在工薪所得项下持续提高减除标准就不是一个方向。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表示,此次我国个税改革,一是将劳动性收入综合计征,提高标准扣除,增加专项扣除,同时还扩大低税率的级次,使适用低税率的税基扩大,这些举措均能够在税基、税率及应纳税额上减少部分纳税人的负担,对于中等收入人群来说是利好的。比如为同一个单位提供劳务的两个人,正式雇佣的就是工资薪金,非正式雇佣就是劳务报酬,两个扣除不一样,税率不一样,税负也不一样,所以若只是简单分类,会造成税收的扭曲性,只能综合征收,但是到综合还需要各种的征管配套,需要时间的过渡。这次要实施综合的四类最相近,

典型的劳动性收入,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其实都是提供劳务的工作,边界不好划分。

蒋震告诉记者,个税的问题是分类税制造成的征管复杂性以及分类税制带来的不公平。不同的收入不一样,所适用的税率不一样,相对来说,劳务报酬的最高税率比工资薪金的边际税率要低,所以劳务报酬越高以及工资薪金越低,税负反而相对较低,也就是同样收入水准的人,可能由于收入结构不一样,造成的税负也不一样。

综合征收、专项抵扣

此次个人所得税修订草案首次引入专项抵扣,草案增加规定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备受关注的个税专项扣除如何设计,如何扣除?一位从事个人所得税征管工作的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中国香港已实施专项抵扣,具有借鉴意义。澳洲会计师工会大中华区理事、中小企委员会主席陈铭严告诉记者,香港总体来说只有三个税种。一个是利得税,也就是企业所得税;第二是薪俸税;第三为租金的税收,即房子出租后的物业税,类似大陆的房产税。

陈铭严介绍,香港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薪俸税,主要针对的是个人与公司签订的雇佣合同,只要提供服务,得到收入,工资薪金就要缴纳薪俸税,2%-17%累进税率,此外香港还设有专项扣除。专项扣除中首先是针对个人家庭方面,扣除较多。以单身或是已婚人士为例,结婚后,若配偶没有工作,夫妻的另一方可以将配偶的额度进行抵扣。单身只有一个基本免税额,结婚的话有两份。第二部分是针对子女,不只是子女教育,在香港只要有子女,都会有一个免税额,最多可以给予九个免税额。一个子女的免税额度是10万港币(一年)。第三是父母或者祖父母,也可以在基本专项中扣除,一年的免税额度是46000港币左右,兄弟姐妹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以专项扣除,比如兄弟有残疾不能参加工作,或者父母、祖父母残疾,再额外多一些专项扣除。此外,政府政策的鼓励方向。比如政策是鼓励个人捐钱给慈善组织,允许个人在个人所得税进行扣减。

陈铭严对记者表示,香港不是代扣代缴,纳税人需要向税务局递交扣除证明,税务局在收到证明后,会给纳税人一个评税单,在限定时间内付税。对于纳税人子女等问题,需提供文件证明直属关系,税务局允许抵

扣。在香港是每年4月1日至来年3月31日。3月31日之后,4月和5月,5月2号三号之前完成申报。陈铭严说:“如果是进修,需要保留课程资料和付款证明,以待税务局进行评估。对于房贷利息,各银行会在每年纳税年度结束后,发给一份能够证明该纳税人在本年度缴纳多少房贷利息的文件。纳税人可以将文件的复印件递交给税务局用以抵扣。”

山大财政系主任李华认为,我国当前学龄前教育和高等教育费用支出相对较高,结合国际通行的教育费用扣除规律,应将教育扣除重点放在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非义务教育阶段。“个人所得税教育费用扣除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减轻家庭教育负担,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为保障税收制度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建议对为教育费用扣除设置限额,包括设置扣除上限或者扣除标准。对于征收(扣除)管理,个人所得税教育费用扣除需提供与教育有关的合法有效凭证,在税务信息系统建设方面,教育费用扣除涉及范围较广,为保障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工作的顺利进行,需加强税务信息系统建设,实现税务局与财政、银行、公安、教育机构等多部门联网和涉税信息共享,提高征管效率。”李华说。

反避税

与以往相比,本轮修订《草案》中还增加了个人反避税的内容。对此,国际税收专家、罗格研究院院长彭启蕾告诉记者,增加反避税条款,是为完善法律体系、堵塞个人避税漏洞、公平不同主体税收待遇,有利于维护国家税收权益。彭启蕾说:“举例来说,个人从关联企业获取股权,使用超低价,市场价格1000万,个人100万买来,卖的时候应该只能卖1000万,然后一个亿卖给海外避税地的关联公司,那么借助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转让定价,人为的调整企业的利润。”彭启蕾介绍,在过往的反避税实践中,同样是不按独立交易原则转让财产、在境外避税地避税、实施不合理商业安排获取不当税收利益等避税行为,如果主体是法人企业,税务执法人员有非常明确的法律依据对避税行为进行调整;而如果主体是个人,税务执法人员苦于无法可依,很难按照独立交易原则对个人的关联交易进行调整。

“此次个人所得税增加反避税条款,使得受控外国企业(CFC)、价格不合理的间接财产转让、直接财产转让等原应用于企业的反避税条款都可能同样适用于个

人。此举对跨国集团公司中担任高管职务的个人投资者产生的影响可能最大。另外,以往拥有其他国家长久居留权的高净值人士,往往利用不同国家对个人所得税制和管辖权设定的差异,人为筹划,获取税收优惠,降低个人所得税税负。随着 CRS 的实施,2018 年 9 月中国居民个人的境外银行等金融账户信息即将被交换到国内来,结合个人反避税条款,可能会对海外资产配置的高净值人士带来极大挑战。”彭启蕾表示。

个税改革牵涉面非常之广,可谓全民关注;但每一次力度大、根本性的变革,都需要做好配套工作。即使是在税务的“征管”,也就是通俗说的“收税”系统这个领域,也必须有相应的进步和配套,才可能更好地服务于个税改革。我们今天继续请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的范子英教授,请他从这些“难题”入手,为我们谈谈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从这些技术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个税改革更为困难也更为深远的一面。

三大难题

大概是三年前,我去一个中部省份的地税局打印我的个税缴纳证明,被告知我只能打印当年的,之前年份的数据由于数据库更换无法提供。更让我吃惊的是,当我把身份证放到那个机器上,居然显示我的身份证号码对应了两个自然人,于是连当年的个税清单都无法提供了。如果是这样一个征管系统,是完全无法应对这次的个税大改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的 6 次个税修正,都没有涉及到征管体系的改革。这次的个税大改,一共是 6 大块内容,除了第 1 条,其余 5 条均跟税收征管相关。这会让税务机关直面三大难题——自然人、家庭、跨地区。

过去几十年的税收征管历程中,整个税务机关都没有直面自然人的习惯,即使是个人所得税这样与自然人密切相关的税种,也是采取代扣代缴的方式。虽然有一个年收入 12 万以上的申报制度,大多数地方也是走走形式,年终申报既不会让你多交税,更不会给你退税。这次的改革中,综合征税和起征点(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的叠加,会让税务机关直面所有的自然人。综合征税,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 4 项劳动性所得,统一纳入综合所得,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

这一条看上去很简单,以前主要是工资薪金的累进性,其他几项实际上都没有做到彻底的累进,大多数

都是比例税率。工资薪金是常规性收入,但是其他几项不是,因此这次的起征点扣除标准是按年计算的(每年 6 万,不是每月 5 千),而不是现在的按月计算方式。

但这样一来,四种所得的综合收入就会在月份间有明显的波动。比如一年中的劳务报酬所得集中在最后一个季度,按照月度的代扣代缴,最后一个季度适用的个税税率就偏高,由于这次的起征点是按年计算,就会产生一个年终统一汇总清算的过程。以后每年的 12 万收入申报制度,税务机关就会把多缴的税款退给大家。理想的个税征收模式应该是按家庭综合征收的,此次的个税改革没有在这方面做出调整,但是其中的专项附加扣除会涉及到家庭层面的问题。

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这些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均是家庭层面的支出;因此在抵扣的过程中,就涉及到夫妻双方,甚至是长辈晚辈之间的分配。例如,夫妻双方共同为一套住房偿还贷款利息,虽然该住房是记在妻子名下,但是实际的利息支出是双方一起承担,住房贷款利息扣除采用的是因城而异的限额抵扣方式。假设当地的抵扣标准是 5000 元,按照社保、专项附加扣除、起征点的抵扣顺序,如果妻子一方面的收入不足以完全抵扣这 5000 的贷款利息,那么就应该由丈夫一方来继续抵扣剩余的额度。

还有更为复杂的情况——如果丈夫的收入超过妻子,按照个税的累进税率,税法也应该让夫妻双方选择,谁来优先使用专项附加抵扣额度。因此,虽然个税在收入端没有采用家庭综合征收,但是支出端本质上是家庭层面的。因此,专项附加扣除的引入,也在实质上推进了家庭联合征收制度。

此外,现有的个税征管基本上是忽视了跨地区的问题。例如,你在两个以上地区取得收入,这两笔收入的个税是各自征管的。但这次的改革,使得税务机关不得不解决跨地区的问题。一方面,部分综合制的 4 项收入(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除了工资薪金之外,其他三项收入都可能来自不同地区。但在征收过程中,这些收入要统一并入“综合收入”,采用 3%—45%的累进税率。因此,只要是综合收入,就必须把多个地区并入同一个系统。

另一方面,专项附加扣除,同样要直面跨地区的问题。现阶段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非常频繁,有大量的

人口的收入地和消费地是不同的,例如在沿海地区工作的移民,其子女教育在户籍地。这样的话,收入端扣个税的时候是在沿海地区,但是支出端的专项附加扣除在内陆,年终汇缴就需要跨地区衔接。住房贷款利息的专项抵扣同样也存在类似问题。面对这些难题,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历史

跟其他的税种相比,个税是比较“怪”的一个税种。具体表现在:是地税局征管,但又不是地方的财政收入。从1994年开始,中国的税务机关有两套:垂直的国税局和属地的地税局。国税局征管的范围包括中央税和共享税,例如增值税、消费税,地税局征管的范围只包括地方税,如2016年之前的营业税。这两个机构不仅在管理体制上是不交叉,在征管的税种上也基本是不交叉的。在2002年之前,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是全部划归地方财政,属于地方税,按照国地税的征管原则,个税一直是地税局征管。但是2002年中国对税收收入分成做了一个调整,将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由地方税变更为共享税,中央财政拿走了其中的60%。

如果采用1994年的征管原则,个税自2002年开始就应该由国税局征管了。但是当时的个税收入很少,同时两个税务系统没有做好衔接的准备,于是个税的收入变为共享的,但是征管机构一直保留在地税局。

除障

看上去,三大“直面”将给税务征管带来巨大障碍。不过,近年来的几项系统改革,基本上为三大“直面”扫清了障碍。比如国地税合并。6月13日,全国省级层面的国税局和地税局已经完成了合并,市县基层的两税系统也会在近期快速推进。如果国税和地税还依然是分设的,可以想象这次的个税改革力度不会如此之大。国地税合并之后,将在全国层面形成一个统一垂直的税务征管系统,新的税务局不再有地区间衔接的难题,纳税人在全国任何地方取得的收入、支出的费用都可以实现跨地区的无缝对接。

又如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号制度的建立。企业纳税人一直有完备的识别号制度,一个企业在不同地区缴纳不同的税收,会有一个唯一的ID来对应。中国的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号制度的建立是相对滞后的,2013年正式确立了以身份证号为基准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

这种制度的建立将为跨地区、跨行业、跨交易的个税征管带来极大的便利,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号将个人在不同部门的信息完全对接了起来。越复杂的个税征管模式,对信息化建设的也就越高。2016年全面上线的“金三工程”,覆盖所有税种、覆盖税收所有环节、覆盖所有税务机关,基本上满足了信息化的要求。这个系统最强大的地方,是与其他部门实现了联网。这就意味着,你在两个地方取得的收入,当地录入纳税信息时,使用的是同一个数据库系统,实际上也就不存在地区间的差异了。

深远

从征管角度看待此次个税大改,就可以发现,这些改革并不单纯是为了个税改革准备的。因此,其影响也比个税改革的影响范围更广、更深远。过去这些年,个税的征管漏洞广受诟病。这其中有地区分割的制度因素,也有信息化建设的技术因素。随着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以及不同部门间信息的联网,个税的征收率会有明显的上升。

比如,从这次个税改革中提到的“反避税条款”就可以看出,个税将不再仅仅是一个“工薪税”了——毕竟,通常需要避税的不太是工薪阶层。又如税收优惠。一些地区给予高收入的企业高管大量的个税返还,有的个税返还是直接给个人,有的是返给企业,导致的结果是,高收入阶层的个税负担非常低。

改革之后,整个税务部门不再是地方政府的下属部门,而是完全隶属于国家税务总局,统一垂直的管理体制,将会有助于全面清理税收优惠。在一个现代国家中,税务局理应是最“强势”的部门,但我国现阶段的税务部门受到各种政策的干扰,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并不能做到依法征收、稽查,绝大多数老百姓也没有跟税务局直面沟通的习惯。这一轮的税改之后,税务局有可能成为老百姓生活中相对重要的对口部门。

从个税改革的内容来看,要使得这些改革内容落地,税务部门就需要有极大的信息整合能力,税务部门需要联合银行、教育、房管、社保等部门,获取纳税人在这些部门的相关信息。因此,个税改革看上去是税务部门自己的事情,实际上需要很多部门给予配合。我们也期待中国的跨部门信息整合,能够借助此次改革得到实质性的改进。

(2018-6-25 腾讯财经)